把父亲的足迹录成『编年史』！

从追忆到传承，一名红军后代二十三载的精神寻根

“我是在替牺牲的战友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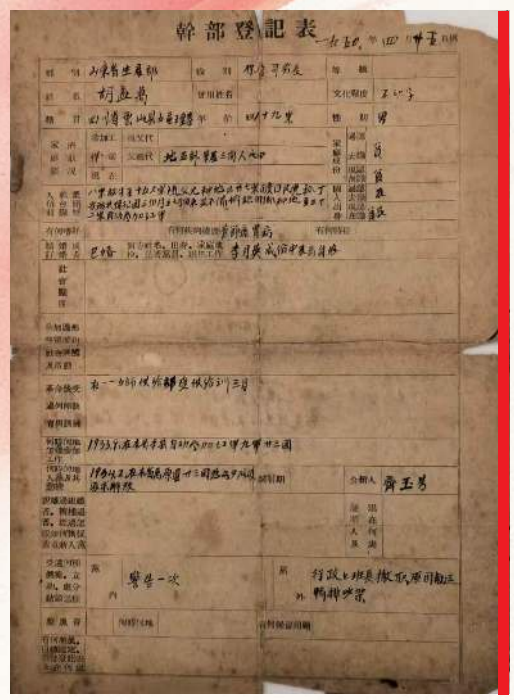
——从尸山血海中突围，他用一生的沉默与自律，丈量着战友未走完的征途。



胡招荣父亲胡懋万

2001年，41岁的胡招荣失去了母亲。在整理遗物时，他发现了一份母亲珍藏多年的父亲履历表（《干部登记表》）。这尘封几十年、一碰就碎的蜡黄纸张，记录着一个他几乎一无所知的父亲——一名1933年参加革命的普通红军战士。那时胡招荣已是部队政委，却对父亲的过往说不出几句完整的话。

父亲胡懋万于1962年离世，当时胡招荣还不满两周岁，家中兄弟姐妹对父亲的记忆同样支离破碎。大姐比他大十岁，父亲去世时她也才十二岁，尚在读小学，对往事基本没有印象。胡招荣曾追问大姐，父母有没有留下什么故事。大姐能回忆起的，只有父亲生前定下的三条规矩。除此之外，家里谁也讲不出更多。正是这份空白，让胡招荣下定了决心。



干部登记表

胡懋万干部登记表正面

二十三年广搜资料 两年成册十万字

从2001年开始，胡招荣踏上了追寻父亲足迹的漫漫长路。

这条路并不好走。2002年，组织派他到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参加军校中级指挥班学习。在校期间，他一边完成学业，一边天天泡在图书馆查阅史料。档案记载，父亲1933年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营山县参加革命，隶属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三团。

然而，胡招荣查阅大量书籍资料，只找到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记录。他判断，这很可能是当年书写时将“7”误写成了“2”。类似这样的细节，他需要逐行比对、反复考证，过程十分辛苦。

身为政委，他还带队前往井冈山、延安、百丈关、四川雅安名山、蒙顶山等地寻访，参观过百丈关纪念馆，实地追寻红军足迹。

他将搜集到的所有内容，结合父亲1899年出生的时代背景，以编年形式编写成书。父亲只是一名普通战士，很难从报章资料中找到个人足迹，胡招荣便从晚清讲到革命年代，从川陕根据地写到延安，用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命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人生。2024年，这本名为《红军战士胡懋万年谱》的书最终定稿。

从搜集资料到成书，前后历时二十三年，正式动笔书写是在两年前，十万字稿纸，凝结了两代人的岁月。胡招荣说，编这本书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给哥哥姐姐以及后辈们留下一份纪念，让后人了解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沉默的父亲与“三不”家规 助子女立身立人

父亲离世时，最年长的大姐也不过是读小学的年纪。但在兄弟姐妹的成长过程中，那三条家规却如同烙印一般刻在每个人心里。不许调皮，不许惹祸，不许借着父母的身份出去招摇撞骗。父亲没什么文化，几乎不识字，却用最朴素的方式划定了做人的底线。他反感任何人拿革命先烈的功绩去显摆，认为这是对革命和牺牲战友的亵渎。

大姐也曾叮嘱胡招荣，不要对外讲述这些旧事，这也是父母生前的嘱咐。然而，这份沉默的背后，藏着更深的伤痛。父亲心里疼爱孩子，从不动手打骂，但管教极为严格。有时候姐姐问起战场上的经历，追问“爸爸，打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父亲听完，转身望向窗外，眼眶里蓄满泪水，情绪难以自控。他说：“我不能给你们讲这些，跟我一起打仗的战友没有几个活到今天！你们知道吗，我是在替牺牲的战友活着。”

母亲也曾讲过，父亲平日里不抽烟、不喝酒，唯独打了胜仗后会喝上几口。可只要喝一点酒，他就会蹲到桌子底下痛哭，嘴里一遍遍念着战友的名字，呼喊着他们在哪里。这种痛苦反复发作，每次触碰，都会勾起心底难以愈合的伤痛。

胡招荣后来慢慢理解，这就是战争留下的心理创伤。当年的老一辈革命者不懂得什么叫心理干预，每回忆一次，就等于再承受一次煎熬，所以父亲始终闭口不谈。这种深埋心底的克制，反而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兄弟姐妹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没有人想过借父辈的身份谋便利，反而养成了一种近乎本能的低调与自律。

九死一生的战斗往事 更教后人忆苦思甜

许多战斗细节，在史料中根本查不到。那是属于家人之间口口相传的私密记忆。这些往事，胡招荣原本并不知晓，直到前年他带着二哥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为父亲扫墓时，二哥才将母亲当年讲的内容转述出来。

父亲离世时，二哥刚上小学。那时候他总缠着母亲，想听父亲打仗的故事。母亲一开始不肯讲，经不住孩子再三央求，便叮嘱他：“我可以讲，但你听了不许哭。”二哥答应下来。母亲讲的是百丈关战役中的一段经历。

那场仗整整打了七天七夜。父亲身为机枪班长，一天深夜，战斗间歇，他抱着枪在战壕里睡着了。一阵风雨把他浇醒了，又累又困、又饿又渴的他迷迷糊糊地捧起地上一个水坑里的水就喝，喝完一抹嘴又睡了过去。第二天醒来，他满脸是血，身边的战友还以为他受了重伤。原来他昨晚喝的，哪里是雨水，那是牺牲在身旁的战友流下来的血水。讲到这里，二哥再也听不下去了。光是想象战场上尸横遍野的画面，就让人难以承受。

百丈关战役的惨烈，在红军长征诸多战役中仅次于湘江战役。当时张国焘带领八万红军南下，在百丈关遭遇四川军阀刘湘三十万兵力阻击，最终仅余四万将士撤离。父亲后来又走过三次草地、翻越两次雪山，到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他因身负伤病被分流，没有编入西路军，而之后红九军几乎全军覆没。

各个根据地出发时总计三十万红军，一路辗转抵达延安时，只剩下三万余人。胡招荣查阅史料后感慨，父亲能活下来，算得上百死一生，概率微乎其微。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更理解父亲为何绝口不提。亲眼看着身边战友一个个倒下，身处那样的环境，所有人都杀红了眼。胡招荣本身也是一名军人，对此多少能体会一二。他在给孩子们讲课时常说，枪林弹雨、腥风血雨这样的词语，都不足以形容当年红军经历的苦难。

“长征精神”的隔空回响 汶川地震中奔赴北川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汶川地震发生。当时胡招荣在成都任职，担任单位处室政委。地震过后不到半小时，上级紧急下达指令，命令他所在单位立刻抽调人员组建小分队，赶赴北川县部队驻地开展救援。

下午四点半左右，胡招荣随行二十人救援队伍，搭乘一辆大巴车从成都出发。彼时余震不断，路面遍布裂缝，他们逆向而行，一路向北。在北川的经历，让胡招荣刻骨铭心。在他的记忆里，抵达灾区后所见触目惊心，他和队员们一同搭帐篷、挥铁锹，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这段经历，也让胡招荣对自己与父辈之间的精神联系有了更深的体悟。他1978年参军读大学，从军数十年，这辈子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没能走上真正的战场。但能参与汶川抗震救灾这种建国以来为数不多的全国性非战争军事行动，从另一个维度也完成了这种精神的践行。

他常说，对父亲精神的追寻，并没有太多花哨的想法，只是用心去梳理过往，把那段真实的革命历史完整留存下来。

从2001年到今天，二十余年过去，胡招荣的心境和认知经历了多次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没变：父亲的经历，早已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股持续感召后辈前行的力量。

晨报记者 徐妍斐

